

浅析莫言小说《蛙》中生命的矛盾与救赎

李若聆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省成都市 610041)

摘要：莫言在《蛙》中描绘了妇产科医生万心的一生，展现了上世纪我国乡村十几年的生育历史，毫不避讳地面对社会敏感话题，讲述姑姑万心在计划生育的洪流之下由“送子娘娘”逐渐变成“刽子手”的过程。《蛙》主动关注人内心世界的痛苦来源，集中表达人的个性，呈现了万心、万足等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矛盾与伤痛，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呼吁人们反思生命、敬重生命，点亮人性的灯火，实现在未来可能发生的自我救赎。

关键词：蛙、姑姑、生命、矛盾、救赎

一、时代背景下姑姑对待生命的转变

姑姑本名万心，是一名烈士后代，根正苗红的她一心要子承父业，于是进修了专区卫生学校。毕业才仅十六岁。县卫生局开办了新法接生培训班，从此姑姑与这项神圣的工作有了奇妙的缘分。她引以为豪的是这辈子接生了一万个孩子。做为一名医生，她无视阶级差别，主动为地主的老婆接生，婴儿诞生的喜悦让姑姑忘却了阶级斗争，医者仁心，此时姑姑体会的是纯洁的感情。生产是一场时间战必须争分夺秒，姑姑每次都以风驰电掣的速度第一时间赶到产妇的家里，她痛恨封建传统的接生方式，对一些“老娘婆”不顾产妇的安危，甚至骑到产妇身上的行为怒不可遏，姑姑用她的实际行动以及科学的态度和威严，成功地接生了许多难产的孩子，逐渐的改变了大家对新生产方法的敌意，“老娘婆”也就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姑姑对生命怀有敬畏之情，对所有的生命都秉持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她不仅为人接生，还为牛接生。她将自己的职业赋予了神圣的使命，在使命下的指引下，她尽力捍卫生命的尊严。这个时候，她是村子里极受欢迎的人物，大家都对姑姑怀有尊重之感。

1965年，国家开始大力号召计划生育，“生男生女一样好”的口号响彻街头巷尾。姑姑身为产科医生经验丰富，是高密乡里执行计划生育的不二人选。但天使与魔鬼，往往是一念之间。与飞行员谈恋爱在上世纪是光耀门楣的事情，可就在姑姑还没有享受几天甜蜜幸福的日子时，王小倜突然叛变逃到了台湾，这对一心向党的万心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她不允许自己的革命生涯中有任何的污点，尽管王小倜逃走时在他的日记里骂姑姑是个“红色木头”，才使她逃过了一劫，但姑姑的内心已经遭到了重创，她不是埋怨爱人的无故离开，而是伤心于组织对她的不信任，为了自证清白，她甚至割腕留下血书。被救治痊愈后的姑姑开始以近乎疯狂的态度对待工作，不谈恋爱，只一味的工作，她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之心。十年浩劫时期，姑姑是卫生系统“白求恩战斗队”的发起人之一。她十分狂热，对老院长和黄秋雅毫不留情，这源于她内心深处的恐惧，因为惧怕王小倜的事情影响自己的前途，姑姑必须先下手为强才能保全自己，病态心理已经在她的行为中有所体现。姑姑从开始的天真善良，对生命等量齐观的慈爱形象转变为一个充满暴力的粗野的执行命令的机器，在她的身上体现的是时代对人格的扭曲。所以在执行计划生育时，她雷厉风行、不遗余力，谁的人情和脸面都不讲也不看，变成了人人厌烦的“活阎王”，在她手上断送了许多孩子的生命。姑姑不怕别人的拳打脚踢、恶语相

向，她自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姑姑的执念仿佛一个巨大的枷锁，而侄媳妇的离世让她更加没有回头之路。万心为了使自己保持镇定，开始通过自我洗脑的方式赋予自己生存的勇气，当计划生育有“漏网之鱼”时，姑姑心中的裂缝就会逐渐变大，甚至整个人都会随之疯癫破碎。当我们从批判的视角分析姑姑时，也要辩证的理解姑姑的行为，因为更多生命的诞生将意味着规则的被破坏，逾越规则是不利于群体整体的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献身者和牺牲者，正是他们的铁面无私，才使得社会发展的脚步迈得坚实。

二、传统与现代思想的碰撞

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一件事从历史的传统的观念出发，就必然会与现代的思想产生碰撞，两者不断纠缠摩擦，历史所驱，无可避免，事情本无对错，双方只不过是在不同的立场上解决同一个问题，只此而已。文中的蝌蚪身为党员，他深受先进的现代思想的滋养，对“养儿防老”的旧思想并不感冒，他并不愿意多生一个孩子而把奋斗多年的成果丢掉。相反的是他的妻子王仁美则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第一胎是姑娘之后，她对生育的愿望变的更加强烈，背着丈夫私自找人取环，即使是袁腮她都欣然接受，这时的她首先是一个母亲，其次才是女人，取环是她，以及村子中像王仁美这样的底层妇女的无声反抗。王仁美大声喊叫着：“孩子是我的，在我的肚子里，谁敢动他一根毫毛，我就吊死在谁家的门槛上！”^[1]在封建思想的压迫下，她们最引以为豪的生育权，做母亲的权利被一点点的蚕食掉了，这对她们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

文中姑姑批评蝌蚪父亲时说：“真是奇怪，女人生了女孩，男人就耷拉脸；牛生了小母牛，男人就咧咧嘴！”^[2]可是蝌蚪父亲却斩钉截铁地回复二者确实不一样。这是多么残酷的对比，把女性和母牛相比，真实的体现了女性没有生育尊严的时代之殇，女性被动的拥有了生育工具的标签。对于上世纪高密乡的男性来说，血脉的传承是由性别决定的，而不是由孩子决定的。这种传统的思想深入人们骨髓，不只男人，在大环境中的女人们也潜移默化的接受并承担着“传宗接代”的重任。村子里的的妇女们基本都患有有子宫下垂和炎症，但是王仁美她们可以不顾自己身体的安全，在远没有达到卫生标准的情况下取环、多次怀孕。她们没有意识到自身真正的价值，只是把生孩子而且必须是生男孩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潜意识的影响下，她们更加的依赖丈夫，在家庭中更没有地位可言，逐渐的沦落为男性眼中的生育工具。王胆身高还不到一米，怀孕风险很大，可她还是义无反顾的要二胎，东躲西藏，在逃离的木筏上早

产,“她身体蜷缩着,像一只倒干了粮食的瘪口袋,又像一只钻出了飞蛾的空茧壳。”^[1]最终离开了人间。王仁美也与姑姑和丈夫纠缠斗争了许久,以至于后来孩子月份大了才被迫引流,导致了一尸两命的惨剧。文章细致地描写了小人物在底层维度下生存过程中经历的无助和绝望、冷漠与暴力,作者将女性在生与死之间的挣扎困境以及代价描写出来,底层女性因丧失了生育孩子的话语权,使她们的内心备受煎熬,她们就像不怕牺牲的烈士一样,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以微薄的个人之力是无法战胜社会力量的。

“蛙”与“娃”同音,婴儿刚出生时的哭喊声与青蛙的鸣叫十分相似,而“蛙”也与“媯”同音,女媯是人类始祖,有着强大的繁衍力量。易中天在《中华史》里说:“女媯是一只大青蛙。”^[2]文中借小狮子之口也说明人类是由蛙进化来的。高密东北乡把“蛙”当作多子图腾,泥塑和年画里也都有蛙崇拜的例子。“蛙”,象征着女性、母亲和生育繁殖。蛙的繁殖能力强,但繁殖不仅是动物的本能,也是人类的本能。这种对生殖能力的盲目崇拜,是父系社会中男性的资本,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有牢固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才是造成王仁美、王胆、艾莲以及广大女性悲剧的罪魁祸首。鲁迅曾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蛙》中不乏血淋淋的文字,用“烂梨”比喻生育过度的子宫,将平日中无法登入大雅之堂的生活的阴暗、丑陋、甚至暴力面都以平淡的语调记录下来,莫言的笔触深入灵魂深处,“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4]《蛙》的悲凉反映了在时代底层的农村女性的凄惨结局。

三、灵魂救赎的反思

年过半百的姑姑,没有意识到自己犯的错有多么深重,直到有一次醉酒之后走到了一片洼地里,那里蛙声如哭,仿佛带有一种怨恨和委屈,她感受到了极度的恐惧,姑姑意识到这是被扼杀的婴儿发出的凄凉、哀怨的控诉,那些婴儿如同蛙一样,对她穷追不舍,许许多多的青蛙牢牢地抓住她的衣服和头发,姑姑一边嚎叫一边奔跑,最终被正在制作月光娃娃的郝大手所救。晚年的姑姑,察觉到自己的罪孽深重,神情恍惚的她饱受精神的折磨和摧残。害怕蛙显示出姑姑内心深藏的恐惧,这是因为她想到了经过自己之手流掉的孩子,还有那些比孩子更痛苦的母亲们——她们所遭受的是肉体 and 心灵的双重打击。姑姑开始忏悔祈祷,不仅是对未出世的孩子们的同情,更是对自己的同情。为了赎罪,姑姑嫁给靠泥娃娃为生的泥塑大师郝大手。她把亲手流掉的孩子借郝大手再一个个的创造出来,这些泥娃娃栩栩如生,姑姑还赋予他们了细致入微的家庭背景,她希望这些娃娃可以被满怀期待的妇女们买走,让他们可以重新来到这个世界,实现姑姑对生命的救赎。

莫言认为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到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作者在揭示人物内心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内心袒露出来,提出自我忏悔要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始终坚持自我剖析的精神。例如作为主人公的蝌蚪,也经历了从犯罪到反思再到救赎的过程,认为自己要起到国家干部的带头作

用,重视组织与自己的颜面,于是他为了前途逼迫自己的妻子王仁美进行引产,最终一尸两命。文章中蝌蚪在给衫谷义人的信中说“我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后,心中的罪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5]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是不可替代的,再真诚的悔改也无法弥补曾经的过错,有此可见,所谓的对生命的忏悔是虚空的,并不能使灵魂得到救赎,在这个基础上,人性的复归也显得极其艰难,作者对生命表达了强有力的反思。^[6]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感受生命,尊重生命。当蝌蚪得知妻子小狮子找人帮自己代孕,他气愤至极,直言自己无法向组织交代,但这只不过是他的托辞罢了,他无法说服自己的良知和道德的责任。他无法面对因为他而离世的前妻。可是他自私、爱妥协的思维始终占据了上风,使得他还是默许了代孕。在内心经过了剧烈的挣扎之后,蝌蚪开始了自我感动,他认为人间最庄严的感情就是对生命的热爱,蝌蚪把自己灵魂得到救赎的希望放在了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试图借此机会摆脱自己以往的罪恶。

四、小结

作品最关键的主题是要表现“个体、人性、情感、生命、灵魂在奇特语境下的畸变和冲突”。^[7]《蛙》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带有悲剧底色的,是封建传统影响下的男权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必须政策,以及广大乡村妇女自身固有的思想藩篱的三重打压下造成的残酷现实。莫言先生用直击灵魂的文字唤醒人们心底的良知,呼吁大家正视生活中的苦难,反思现实的同时也要敢于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善于剖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在未来的选择中有更多的机遇。莫言在《蛙》中的后记里坦言“写完这部书后,有八个大字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8]在悲痛的经历的指引下反思自我,做到敬畏生命,救赎生命,是有利于人性的复归的。

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只有始终拥有一颗尊重生命的内心,才不会在浪潮之中迷失自我,才有可能在悲痛中实现真正的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 [1]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 [2]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 [3]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 [4]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M].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12-01
 - [5]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J].语丝周刊第15期,1925年2月23日
 - [6]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J].2008年04月25日
 - [7]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 [8]蒋晶晶.从莫言《蛙》中姑姑的形象来分析生命的拯救、毁灭与救赎[J].今古文创,2019-08-26(2019)15-0012-02
 - [9]梁振华.虚拟的真实与真实的虚幻——莫言《蛙》阅读札记[J].中国图书评论,2010(4):93-98.
 - [10]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 作者简介:李若晗,2000.12.18,女,山东省菏泽市,学生,本科,西南民族大学,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